



大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三十四次全体会议

1997年10月17日,星期五,上午10时

纽约

主席: 乌多文科先生 (马来西亚)

嗣后: 杰尔先生 (南非)

上午10时10分开会。

议程项目22

联合国同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的合作

秘书长的报告(A/52/299和附录1和2)

决议草案(A/52/L.1)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邀请法国代表介绍决议草案A/52/L.1。

德雅梅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两年以前,大会未经投票通过了题为《联合国同文化技术合作机构的合作》的第50/3号决议。

我谨代表在纽约的法语集团在此议程项目下提出另一个决议草案。这份决议草案显示过去两年中根据50/3号决议所进行的合作是有成效的,并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我补充说一下,佛得角、波兰、塞舌尔和突尼斯现在已加入这份决议草案的41个提案国。

1978年,该机构取得了观察员地位,这一关系便开始了,并在过去两年中迅速发展。

这种合作形式是由多个坚实的承诺所决定的,特别是1976年合作机构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之间的第一个合作协议。随后,该机构在1990年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达成了一项协议。该机构与联合国相互参加各自的活动使更好地了解 and 评估使现有的资源服务于共同利益和目标成为可能。我们欢迎1995年5月合作机构在纽约开设办事处。这大大促进了这一和谐性。

1995年10月16日通过了第50/3号决议。之后,合作机构于同年10月26日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缔结了一项合作纲要协议,1996年10月,合作机构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缔结了一项协议,该项协议包括数个供执行的发展项目和方案。

自此以后,1997年6月25日,联合国秘书长与合作机构签署了两个机构的合作协定,这使这些协定得到公认。1997年9月8日,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合作机构也签署了一项类似的协议。

这些协议标志着一种新的鼓舞人心的前景。在实地机构与儿童基金或开发计划署采取的联合行动使资源与人力协调服务于发展。

与儿童基金会展开的活动包括,在贝宁、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以及越南乡村为女童和年青

妇女提供扫盲教育；在吉布提向流离失所或贫困家庭提供基础教育；在越南的小学教育方案；在海地提供培训教师与校长及提供教学材料和资源的技术援助方案。

与开发署的合作的协议特别是旨在加强法治，促进和保护人权，支持民主进程和良政，组织及加强国力，以及改善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除其它外，这些计划还支持小型和中型企业的建立与管理。

我们必须通过更有效的协调来欢迎这种互补性。这一互补在实地已产生了效果，并为需要它的人带来了好处。这增加了这些项目推动者的能见度和信誉。

6月25日，联合国秘书长与合作机构合作协定的签定标志着联合国与合作机构的伙伴关系具有一个新的内容。这份协定将合作扩大到新的领域，如：预防性外交、维护和巩固和平以及遵照第50/3号决议第四段的规定扩大到政治、经济、社会、科学与文化领域具有共同关心的一切事务。协议还包括交流信息与文件。

最后，我们欢迎9月8日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签定的最新的一份协议。这份协议将重点放在联合行动上。这些联合行动包括加强法制，保护人权，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权力，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以及仇外主义。这份协议还特别通过培训班这种形式将业已存在多年的合作加以巩固和具体化。在培训班上，合作机构获得的经验得到了妥善的利用。

合作机构与联合国发展的合作关系之类型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协议。特别是对话与对待代表性起了作用。我想强调法语国家在为有关可持续发展所召开的第十九次特别联大准备过程中所作的贡献促进了不同政治、地理、文化及社会背景的国家达成共识，因为这是法语国家的使命。我们希望这一积极而又具有成果的经验将在为明年春天在巴黎召开的水问题部长会议所作的准备工作中再次体现。

我还想提及这种合作关系扩大到对法语国家提供竞选援助，这种援助促成了前几周召开的一个非常具有成果的会议。

然而，我们尚未尝试协作的所有可能性。最近，秘书处政治事务部、维持和平行动部以及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都表现了新的兴趣。合作的前景将带来许多好处。

我现在在大会这里发言时正是在大会堂这里派有代表的许多国家所将参加的河内首脑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因此我非常满意地强调，代表法语国家的机构，尤其是我——我要补充指出——将在河内以法语共同体机构命名的组织对在这里所寻求的目标作出的贡献。

毫无疑问，这一合作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它所创造资源的合理化和协同作用。这一合作有助于避免出现任何无益和耗费大量资源的重叠。

同样，在多边主义形成共同理想而努力的声援网络并增进合作时，它的能动作用也是如此。关于联合国与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之间合作的决议已产生成果，而且仍然包含许多新的项目。

因此，我们希望这些承诺将在今后两年里得到兑现。因此我们感谢所有会员国支持这项决议草案，以便秘书长能够在要求他在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上提交给我们的报告中审查这些新成就。

基迪昆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1970年3月20日在尼日尔共和国尼亚美成立的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的诞生是为了这样一个理想：使以法语为共同语言的国家联合起来，开展共同努力，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不断对话，体现各国人民之间的一种新的团结精神及相互间和睦关系的一个进一步要素。

今天，在该机构成立二十七年后，它的成员已包括47个国家和政府。作为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之间聚会进行对话的一个场所，这一独特的法语国家政府间组织的首要任务是，确认和发展成员在教育 and 培训、文化和通讯、能源、环境、农业、经济发展、科学信息以及支持民主和法治等领域的多边合作。

该机构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新的关系。这一关系已建立若干年。1978年，大会给予文化和技术合作机

构观察员地位,从而使它能够作为观察员参加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的所有会议。

自那以后,文化技术合作组织参加了大会的常会和处理与该机构的活动尤其相关问题的附属机构的会议。此外,它还参加了一些大型会议,例如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地球问题首脑会议、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世界粮食大会等。

与此同时,在我们法语国家积极筹备即将于河内举行的法语国家首脑会议的时候,我们欢迎该机构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得到继续发展。

在教育和文化领域,该机构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正密切协作,实施两个组织共同关心的方案,例如基本教育、教师培训和远距离教育等。该机构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于1990年签署了一项框架协定。其中规定在能源、工业技术、中小企业的建立和管理、可行性研究以及促进投资等领域实施共同项目。

该机构还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专员办事处)在他们有着共同具体利益的领域缔结了合作协定。

简言之,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大会通过第50/3号决议后的过去两年里。我们非常希望这一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以为两个组织带来好处,并促进和平与国际合作。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将不遗余力地促进这一富有成果的合作。

布瓦松先生(摩纳哥)(以法语发言):摩纳哥公国自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于1970年在尼亚美成立以来一直是它的成员。摩纳哥尤其欢迎发展和加强这个汇集以法语为共同语言的国家和政府的机构与从一开始就给予法语以一种外交语言的适当地位的联合国之间开展合作。法语是联合国秘书处的两种工作语言之一,而且是联合国各机构的六种正式语文之一,也是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使用的语言;因此,法语为这两个政府间组织之间合作的建立及

其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1978年,联合国大会在第33/18号决议中已考虑到这一特性及其所带来的潜力,它请上述机构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它的届会及其各附属机构的会议。

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以此种身份参加了联合国举行的大型世界会议,并为会议作出了贡献。例如,1990年世界儿童首脑会议、1992年地球问题首脑会议、1993年的世界人权大会和东京非洲发展问题国际会议、1995年的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1996年举行的第二次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及今年6月举行的大会第十九届特别会议。

在每种情况下,筹备会议和工作组使法语世界能够一系列问题上以一个声音发言,这有助于我们在因其性质和范围常常是至关重要的案文上谋求妥协。

这种合作完全符合两个组织的宪章授权:促进和平、国际安全、民主及经济和社会发展。

由其《宪章》第一条所界定、去年12月在马拉喀什修订并通过的该机构目标包括援助建立和发展民主,预防冲突,支持法制和人权,促进各种文化和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通过提高相互认识使各国人民和睦相处;以及最后,通过多边合作加强其成员的团结以促进其经济扩展。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和该机构秘书长让·路易·罗伊先生在1997年6月25日正式签署的合作协定使其成为官方文件,从而确认了两个机构合作的决心。

该协定已经导致两个组织就某些非洲国家、主要是大湖区域内的危机今年6月在巴黎和今年7月在利伯维尔进行协商。关于选举援助,该机构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及它多年来有信心和有效地与其合作的非政府组织的经验发展了众所周知的专门知识。它还同联合国及区域组织一起向提出要求的国家提供经常性援助。

同样,鉴于其体育和文化性质,法语国家运动会——第三届刚刚在马达加斯加举行——是来自法语社会36国年轻

运动员和艺术家共同参加进行和平与友好竞赛的机会,旨在发展他们之间的跨国界的信任与团结。经常举行这种运动会,每次在不同国家举行,无疑加强参与者的相互谅解,从而促进和平与国际谅解。

这种合作还扩展到对于我国政府十分重要的活动,即善政,促进和保护人权,建立法制,支持民主化进程以及改进司法系统和议会间合作。

合作机构及其国际学校通过在讲习班、讨论会和实践活动为政治当局、治安法官、警察、教员和学生进行训练和提高认识的方案在这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些支持并补充联合国行动的行动应该得到比以往更大的强调和鼓励。

今年9月8日,该机构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拟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它将必然导致在这些关键领域中进一步发展共同主动行动。

尊重人类尊严及其最深切愿望的和睦、持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与联合国共有的基本目标之一。

今后还应通过加强两个机构的合作来增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转让和管理自然资源以保护环境领域中在这方面发展的有针对性和务实的活动。

在该机构广泛考虑到,而且常常以十分新颖的方式考虑到发展和国际合作的人的方面,它促进在多语言主义和多文化主义基础上团结其伙伴的主动行动。

该机构1993年发起的非洲艺术和娱乐市场是一个例子,表明参与法语国家之间合作的国家决心不仅从经济的角度,而且从丰富文化和知识的角度看待其项目。

关于文化的政府间公约草案是这方面另一个例子和象征。它是该机构成员的国家和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真正标准化措施,是按照1995年12月科托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最高级会议以及1996年2月法语国家都长会议的授权认真拟订的。

案文特别规定签署国承诺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以确定并集体管理特许权使用费及有关权利,以根据1961年《罗马公约》方便作家、翻译人员或演员以及签署国立法认为属于这类人的任何个人传播作品。

这自然使我要强调联合国和该机构在几个层次上和整个联合国系统,包括诸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或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等不同专门机构之间的合作。

教科文组织和法语机构十分密切地合作,例如,在执行国际促进学习非洲语言和文化基金的某些方案中合作,这些方案承认方言和混杂通用语作为发展和特性因素的位置和作用。

在两个政府间机构于1976年签署并在1990年由设立一个联合国协商委员会的附加议定书加强的合作协定基础上,教科文组织和该机构在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及课外教育--真正考虑到进步的人的层面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本基础--经常进行联合业务活动。

对该机构和教科文组织来说,发展是多层面的,不能将发展缩小为只是经济增长。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和技术当然是单独的因素,但是它们是互补和相互依存的,而以人及其真正需要为中心的发展本身只有通过集中注意所有这些因素才能得到确保。

在我们今天纪念消灭贫穷国际日和向蒙受贫穷的那些人致敬之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即:不能将发展和进步局限于实行宏观经济理论,而必须通过具体和切实行动作为针对每个大陆上最贫困和最匮乏的人的一项优先工作。这便是约瑟夫·弗雷辛斯基神父向我们传递的信息。他是促进这个消灭贫穷国际日的ADT第四世界的创始人。

这便是今天发展援助的主要人物在承担以下任务时所理解的信息,他们承担促进简单、实际和可行的项目,这些项目是符合他们所关心的社区的日常要求的。这便是文化和技术发展机构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无保留作出的选择。

自1990年以来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合作协定促进了在工业、农业、渔业、畜牧业和甚至使用太阳能领域中具体项目的执行。

也没有忽视南北贫穷的城市地区。弗雷辛斯基神父描述为“第四世界”的最易受害人口居住在极其岌岌可危的条件下,在每个主要城市都能发现这些人。他们是旨在改善其生活标准和环境的研究和研讨会以及培训和社会一体化项目的重点。同开展适应有关地区的经济和商业活动相结合,得到该机构支持并且往往是在象第三世界环境发展行动这样的地方机构协助下进行的微型经济和微型财政项目已经取得有利、迅速和持久的成果。因此,我们必须通过鼓励这种及时的机构间合作来促进这些项目。

这些方案尊重人的多样性及其对人类进步和基于共同历史的自然团结所作的贡献。我们认为这些方案很好地反映了构成整个联合国系统同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之间合作的哲学基础。

我想我找不到更好的论点敦促大会(它总是乐意在物质和智力方面改善今天男男女女——尤其是其中最贫困的人——的生活)通过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致力于这种合作,摩纳哥公国是决议草案的一个提案国。

这一案文的通过将对该机构的伙伴发出受人欢迎和令人鼓舞的信息,它们也是联合国会员国,并将在最近的将来在越南河内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的会议上聚会以除其他外恢复它们合作的框架并通过有史以来第一次选出讲法语国家的一位秘书长来加强它们的机制。

特纳塞斯库先生(罗马尼亚)(以法语发言):我今天很荣幸代表一个讲法语的传统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初的国家发言。1991年,在罗马尼亚成为使用法语为共同语言的国家运动的一名正式成员时,它谋求确保其现代文化传统的连续性,这一传统深深充满着法国精神和价值观念。

今天关于联合国同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之间合作的讨论是在世界规模文化发展处于特定关头时进行的。在自从我们上次讨论这一主题以来的两年中,扩大全球通讯

和数据网络的进程已经加速。这一发展为下一个千年的普遍文化为文化多样化的前景以及为我们讲法语国家的合作提供了机会和挑战。我们的共同义务和责任是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和电波传递由法语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和现代价值观念。

秘书长关于这项议程项目的报告(A/52/299和Add.1)提供了近年来联合国同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之间合作所取得进展的详尽和全面的情况。我谨指出几个因素,我们认为这几个因素对加强这种合作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第一,将法语作为一项共同语言使用的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联合国的工作给予了政治上的支持,他们决心同联合国系统各个组成部分建立一种新的伙伴关系。这是一个表明政治意愿能产生有利于两个组织及其成员的硕果的例子。

第二,我们所想到的是两个组织都共同采取行动和感兴趣的领域的存在。该机构同联合国所进行的某些活动和方案具有互补性质,这导致其秘书处定期进行讨论以确定促进它们的合作和协调的主题、措施和程序。

第三,我们认为通过该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若干机构之间制订和缔结合作协定来建立一个进行此种合作的法律框架为它们关系的连续性和长期稳定提供了保障。我们认为这两个组织的秘书长于1997年8月25日签署的协定对加强这种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根据该协定的规定,联合国和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可决定联合行动实施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项目、设立委员会就具体事项向它们提出建议以及交流信息和文件。

我们欢迎该机构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签署的框架合作协议,并相信所有讲法语国家都会纪念199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五十周年。这是我们大家对让-贾克·鲁索以及所有为捍卫他的理想而牺牲的英雄所负有的道义。

使这两个组织间合作发展到现在水平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纽约办事处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最衷心地祝贺办事处的工作。该办事处所开始的持

续磋商推动了讲法语国家之间交流资料和看法以及起草几份与这些国家有关的文件。关于中期审议和评估《21世纪议程》全面执行情况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包括作为我们集团对会议的贡献的一份文件的起草工作,是该办事处活动的重要时刻。

第三届新兴或恢复民主国家民主和发展问题国际会议9月在我国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是由我国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组织的。会议的主题是民主和发展之间的关系。77个国家、包括几个讲法语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学术界和大学的高级代表介绍了经验和对该题目的看法,通过了一份会议文件,该文件现在已经成为联合国的正式文件。

我们介绍这些情况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是要感谢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对该会议开始的进程作出的慷慨的贡献。其次是建议研究我们既是讲法语国家、又是联合国会员国在民主化进程中的经验作为我们之间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起草这样一份可提交给于2000年由一个非洲国家主持的下一届会议的研究报告,将不仅提供在我们国家之间、而且在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与联合国之间进行合作的一个新领域。可以由我们在纽约的常驻代表团与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办事处合作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磋商。

哈沙尼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审议题为“联合国同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的合作”的议程项目22,为突尼斯提供了就这一题目发育的好机会。

该机构与联合国的关系是典范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追溯到1978年,当时大会通过了第33/18号决议,给予该机构以观察员地位,使之能够参加本组织及其各附属机构的工作。使该机构通过不仅参加在纽约的活动,而且在过去六年中参加联合国及其主要附属机构的重大活动,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我强调指出,不论是1990年在纽约召开的儿童问题世界首脑会议、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首脑会议、199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和发展问题会议、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妇女问题世界会议、还是在1996年召开的第二次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上,该机构都在确

保、协调和调和该机构成员国之间立场方面发挥了有效和重要的作用。该机构是十分独特的组织,它虽散布在几大洲、但却讲共同语言并有共同的崇高目标的国家组织起来。尽管这些国家文化和地理情况各异、发展水平不一、但这些崇高目标使他们团结在一起。

该机构成员国团结在一个共同理想之下,它们把自己看作是一种新团结的体现,一种把各国人民更紧密团结起来在各文明之间不断对话的新因素。该机构成员努力通过在教育、训练、文化、通讯、能源、环境、农业、经济发展和科学信息等广泛领域的具体活动,通过支持民主和法治来反映这种全球团结的理想。

不加强国际合作,就无法进行作为该机构各项活动基础的雄心勃勃的公民和发展项目。正因为如此,该机构1976年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1990年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1996年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达成了合作协议。

在教育方面,该机构和教科文组织的活动集中在基础教育和出版各种教学材料和手册上。与工发组织的合作除其他外,集中在创建和管理中小企业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适当技术上。儿童基金会和该机构除其他外,为各国农村地区的女孩和妇女制订了教育和扫盲方案。1996年同开发计划署签署的框架协议促成了发展中国家在合作援助、教育、文化、环境和能源等广泛领域里的合作。

该机构与各专门机构发展的多方面合作的一个成果就是大会1996年通过的第50/3号决议,该决议将该机构和联合国的合作制度化。根据该决议,联合国和该机构在许多不同的问题上进行了共同的努力,中非局势发展和各方为解决该区域危机提出的倡议,向讲法语国家提供选举援助,可持续发展、包括筹备专门审议《21世纪议程》执行情况的大会第十九届特别会议。

同时,两个组织相互出席各自组织的会议情况有所增加。因此,联合国秘书长出席了1995年12月在贝宁科托努召开的讲法语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五次首脑会议。联合国还出席了1997年5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讲法语

国家关于信息高速公路和信息新技术的部长级会议,以及1997年6月讲法语国家联系集团关于大湖区局势的会议。

今天,该机构和讲法语国家正准备进入一个新阶段,今年11月即将在河内举行的首脑会议将对这一新阶段作出规划。在联合国准备通过自身改革严阵以待迎接新千年之际,从各方最大利益出发加强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极其重要。两个组织的秘书长今年6月签署合作协议,目的就在于此。今天上午法国常驻代表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确认了这种恰当的一致性。

突尼斯高兴地重申它支持联合国与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突出地表明这两个组织的观点与目标完全一致,并执行和巩固了本组织在区域的一级的活动,特别是在发展和发展合作领域。

春午光先生(越南)(以法语发言):我荣幸地发言支持法国大使在介绍决议草案A/52/L.1时所作发言中表达的重要观点,这项决议草案是为了加强联合国与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之间的合作。越南高度赞赏该机构进行的有效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越南决定成为关于联合国同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之间合作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

过去27年里,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为实现以法语为共同语言的各国的共同目标作出巨大贡献。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正成为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的聚会点及合作中心。它使说法语大家庭内的各国团结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个参与全球对话的共同体。它还是一种特别政府间工具,保证说法语共同体各国和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取得成功。

该机构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若干年前。1978年,大会通过第33/18号决议,请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作为观察员参加其各届会议和在大会主持下举行的所有会议以及它各附属机构的会议。此外,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与联合国各附属机构在共同关心的领域达成的一系列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了双方之间的关系。大会通过第50/3号决议,给了这一关系特别的推动,并进一步加强了联合国各机构与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之间的合作。

越南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其各专门机构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和方案同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过去两年中进行的合作在许多方面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我们相信,加强联合国与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之间的合作将不仅有利于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并且有利于联合国目前的改革进程。

副主席耶莱先生(南非)主持会议。

特别是联合国秘书长同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秘书长于1997年6月25日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以加强在两个政府间组织之间的关系,这项协议标着我们之间合作的新阶段。越南相信,这将为采取具体行动,以及为确定符合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合作项目奠定非常坚实的基础。

越南受益于法语国家常设理事会、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以及其他法语国家之间的密切协调,它准备于11月在河内担任第七届法语国家首脑会议的东道国。这将是说法语国家第一次在亚洲举行其首脑会议,是法语国家团结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越南承诺将尽一切努力使这次首脑会议最得成功,并对来自说法语国家共同体的49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代表们表示欢迎。

最后,越南希望联合国以及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将继续享有第50/3号决议创立的这种合作精神,以便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加深和扩大合作。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决议草案A/52/L.1将获得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支持。

勒隆先生(海地)(以法语发言):海地代表团高兴地成为题为“联合国同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的合作”的决议草案A/52/L.1的共同提案国。这是我们极为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请允许我回顾,海地出席了尼亚美会议,会议上以法语为共同语言的21个国家和政府于1990年3月20日缔结了建立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的《公约》。今天在27年后,我们这个机构已发展成为来自五大洲的49个国家和政府的聚会点。

今年11月将在河内举行讲法语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七届两年度会议。在亚洲举行这种会议,是本共同体成员多样化以及我们的成员数目随着每一届首脑会议而继续增加的新象征。

这种增长证明了该机构的力量及其完成其任务的能力,即支持和发展其成员间在诸如教育和培训、文化和交流、能源、环境、农业、经济发展、科学信息和支持民主与法治等方面的多边合作。

该机构同联合国和其他组织一道促进和平与发展。正是为了突出联合国与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行动之间的明显互补性,1978年在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上根据第33/18号决议给予该机构观察员地位。

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本着其《宪章》的精神,与联合国系统建立了广泛和多样化的关系网络。它在由联合国举办的各种会议和首脑会议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年来,它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在其各种丰富的事件和活动中密切合作。

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签署的一项框架协议协定,导致在15个讲法语国家制定了旨在适当考虑到保护环境的情况下援助各国人民及可持续发展的人的工业发展规划。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还同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这两个机构感兴趣的方面签署了合作协定。它几年来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而这两个机构最近于今年9月份决定以签署一项新协定再次推动其关系。

可以看到,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的活动范围是广泛的,多方面的。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新挑战的规模,需要扩大对发展政策的协调,而联合国与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之间的合作则继续为此作出有效贡献。

我们确信,大会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的通过将加强这种合作。

勒安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大会于两年前首

次通过了正式承认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与联合国之间合作的决议。该决议开始了我们所欢迎的一种新的伙伴关系。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当时在联合国开设办事处,从而使它的存在更为明显,并使它能够扩大联合国讲法语国家之间的合作。

该机构是讲法语国家的机构,也被称作法语国家共同体机构,现包括来自四个大陆上的44个国家和政府。这保障了在这一讲法语中心具有多种多样文化和观点,这进一步凸显了它们的对话所产生的团结。

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的主要使命,是促进这种对话并确保教育、文化和交流、能源、环境、农业、经济发展、科学信息和法治方面的合作。鉴于联合国的使命是在全球范围处理这些问题,则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与联合国应进行交流以利用其互补性,是合乎逻辑的。

这种伙伴关系为时已久。文化技术合作机构自1978年在联合国获得观察员地位以来,诸如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机构已同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签订了合作协定。我们高兴地看到,其他机构也表示了签订这种协定的愿望。

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并没有这类政治使命。然而,去年12月在马拉喀什通过的《法语国家共同体宪章》序言中所述讲法语国家的理想,是自由和人权,正义和团结;民主、发展和进步。

我们认为,在技术支助以及在举办使讲法语国家聚集一堂的研讨会方面,该机构的贡献会是十分宝贵的,并开拓了有希望的合作。该机构目前在大湖区的法律和司法合作,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我们鼓励该机构与这一领域中的其他角色密切合作来完成这一工作。在人权领域中进行的以及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合作协定,使我们尤感高兴。

已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订了协定。我们欢迎这一情况以及正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进行的合作,由于这两个机构对文化的共同专注及其长期的协作,它是这种合作的最佳范例之一。

比利时是法国就该项目所介绍的决议草案的一个提案国。我们对过去两年来推动本组织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感到高兴,尤其对今年8月签署了合作协定而感到高兴,该协定力求加强有关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和文化领域中共同感兴趣的所有问题的协商。

我们希望,这种合作将继续发展,从而能够确定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可采取支持联合国的行动的具体行动领域,帮助它完成其常常是很困难的任务。这种合作将有利于促进它们的共同目标,即为国际社会服务。

卡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我们今天审议的关于联合国同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的合作的项目,对我国代表团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1970年3月20日在尼亚美成立了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这是实现把使用法语为共同语言国家聚集起来参与一项共同项目的计划中的里程碑,从而有利于表达团结,通过各国人民的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富有成效和持续的对话而在其间建立了和谐关系。

这一理想的首批倡导者之一,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总统,也是第一批为在合作与团结的框架内成立一个向所有国家开放的讲法语国家共同体而奋斗的国家元首之一。根据桑戈尔总统的说法,这种办法将促进普遍在泛人类文明的到来,而它不过是一个施予和获取的聚会场所。

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创建的,以便成为一个讲法语国家大家庭内开会、对话与聚会的适当框架。其目标是最终导致成立一个有组织的共同体,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各方面国际活动。因此,该机构的任务是在其成员中促进和发展教育、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廉政、预防冲突和加强法制等关键领域的多层面合作。

我们几乎不必强调,该机构的目标同《联合国宪章》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是联合国同该机构彼此合作的范畴,两机构的日常生活必须反映这种关系。

大会曾在其1995年10月16日第50/3号决议中注意到

该机构活动同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方案活动的互补性。作为执行该决议的一部分,两机构根据旨在加强其在共同关心问题上、特别是在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领域相互关系的一项合作协定,建立了合作机制——这些机制自今年6月25日以来一直存在。我相信,这项协定将使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和联合国能够更密切地进行合作,以便更好地回应各国人民和各国的期望,这两个机构正是为它们创建的。

因此,我请会员国支持塞内加尔提出的决议草案A/52/L.1,并支持联合国与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所做的共同努力,以便为和平和国际团结的利益,巩固、扩大和深化其合作。

卞万奎先生(毛里求斯)(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对于法国常驻代表提出的关于联合国同文化和技术机构合作的决议草案表示赞同。

毛里求斯作为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的创始成员,欢迎联合国和该机构关系迄今取得的重要进展,秘书长报告所载资料已表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对此非常感谢。

联合国同该机构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78年,当时大会通过了第33/18号决议。但特别在本十年初,尤其在1991年先在维也纳、1995年又在纽约这里开设该机构驻联合国联络处以后,这种关系才获得新的势头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很自然,该机构在1996年即成立6年后首先设法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这个联合国大家庭成员之一建立联系。这种关系通过1990年签署1976年合作协定附加议定书而得到加强。该机构一开始曾努力给予促进最广义的教育明确优先。扫盲、技术培训、职业培训和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技术教育已成为大多数成员国部长和国家元首的主要关切。今天,教育和培训仍是该机构的优先事项,文化活动也在尼亚美召开的成立该机构的1970年会议上占有突出地位。

最近,机构又同其他联合国机构缔结各项合作框架协议,其中包括1990年11月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

织)缔结的协定和尤其在通过第50/3号决议后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缔结的协定。6月份两组织秘书长为加强和扩大其关系又签订了一项合作协定。从而使该系列得到了补充。

该机构正在同开发计划署和工发组织一起实行各项强调促进微小企业的经济发展方案,该机构在此领域,特别在最不发达国家已获得一定专业知识。我国代表团还要突出表明,工发组织和该机构在组织各项活动,促进印度洋国家渔业、生畜和农业领域产品加工工业合作方面彼此进行了合作。还同儿童基金会一起特别在教育 and 扫盲培训领域实施了各项旨在使少女和少妇获益的联合方案。该机构还协助儿童基金会执行各项旨在促进和保护妇女儿童权利的方案。

两机构之间的合作今后也许应该把焦点集中在促进法治和廉政以及预防性外交领域上。该机构同联合国几年来一直在人权领域执行联合方案进行合作。为加强法治和支持民主化与廉政进程,还主要同位于日内瓦的人权中心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起进行了共同努力。由于上个月已签署一项新的合作协定,该机构同人权中心之间的联系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机构同联合国的合作不仅局限于从事各项实地活动。由于该机构的主动行动及其物质和后勤支助,以法语为共同语言的国家还在过去几十年期间联合国主持召开的历次重大国际会议上举行一系列会议和讨论。我们认为,讲语国家之间的这种对话为历次国际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读了秘书长的报告后,我国代表团相信,通过这项决议草案将不仅有助于加强联合国和该机构已经堪称楷模的关系,而且也有助于扩大和深化这些关系,促进两组织间互利,并最终促进整个国际社会福利。

在结束发言前,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向将于今年12月任期届满的该机构秘书长让-路易·罗伊先生致敬,并对他为联合国和该机构和睦所做的杰出贡献深表感谢。

迪亚塔先生(尼日尔)(以法语发言):正如各位成员所

知,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于1970年在我国首都尼亚美成立,旨在促进把法语作为共同语言国家间的合作特别是在教育、文化、培训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多边合作。

回顾该机构在过去27年中的活动,我们可以再次肯定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对实现联合国的宗旨之一作出了重大贡献,经国际合作解决经济、社会、知识和人道主义问题,从而使各国人民更加密切并加强其团结。

该机构的效力主要反映在它对发展中成员国提供的大量支持,以发展它们的教育制度、保护它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它们的环境并开发其经济潜力。

可喜的是,一个从事对改善人类社会未来如此重要的活动的机构,在最初阶段就与联合国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大会于1978年给予它观察员地位,这使该机构能够更多地参与了本组织及其附属机构的活动。然而1995年10月16日第50/3号决议的通过,指出了两个组织活动的互补性,并为新的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

为促进该决议各项规定的执行,联合国秘书长及该机构总干事于1997年6月25日签署了一项合作协定,两个组织据此承诺在共同感兴趣的方面进行合作,在某些领域中提供相互协助,并确定两个秘书处之间的有效联络,我国代表团欢迎这一协定。

我国代表团认为,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通过其很多活动,确实能为联合国秘书处更好地为国际社会服务的努力作出很多贡献。该机构在十分具体领域的作用,清楚地反映在秘书长有关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项目的报告之中,即分别为1997年8月27日以及1997年9月16日的文件A/52/299和A/52/299/Add.1。在阅读该报告时,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诸如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机构,目前正在与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密切合作,而秘书处内诸如政治事务部、维持和平行动部及经济及社会事务部等机构,也表示愿意在各个方面建立合作关系。

我国代表团在此欢迎在民主化及防止冲突方面建立合作。在这些方面,该机构具有丰富的经验与大家分享。

尼日尔和很多其他非洲国家可以证实这一点,因为大多数这些国家处于民主化进程中,受益于该机构在帮助和观察选举、改善申张正义的条件及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起的活动。

谈到维持和平与防止冲突,该机构通过其解决一些讲法语国家的危机的努力而显示出其价值。它与非洲统一组织的接触于1990年3月导致签署了一项有关合作的框架协议,这些接触可以从同样的角度来看待,因为它们涉及协调两个组织为加强非洲各国防止冲突和维持该大陆和平的能力所进行的努力。

我国代表团谨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阁下关于该议程项目的出色报告。报告中的信息证实了联合国与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之间关系的活力。国际社会应鼓励这种关系,因为它促进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出于所有这些考虑,我国代表团与其他国家一道,成为法国代表刚才介绍的1997年10月15日的决议草案A/52/L.1的提案国。我们确信,该决议草案将得到会员国的一致支持。

亚库布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高兴地与其他国家一道成为有关联合国与文化技术合作机构之间合作的决议草案A/52/L.1的提案国。

自从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办事处于1995年10月25日在纽约正式开设以来已经两年,而自大会于1995年10月16日未经表决通过题为“联合国同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的合作”的第50/3号决议也有两年了。

两年未免时间太短,无法冒昧评估两个组织之间得到加强的合作,然而我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同该机构之间20年的关系于1995年进入了以两个组织之间签署新的协定为标志的新阶段。我要举例提到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1995年10月26日签署的框架合作协定,以及该机构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6年10月2日签署的框架合作协定。

此外,两机构秘书处之间还更加定期地进行了协商和

对话。我要在这里提及联合国秘书处同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秘书处高级官员之间进行的协商。协商的中心内容包括中非的事态发展和各方采取的主动行动,以设法和平解决大湖区危机,应其请求向法语国家提供选举援助,以及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专门审查和评估《21世纪议程》执行情况的大会第十九届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

这些不同的讨论与合作领域证明了这种关系的活力,而且首先证明了联合国同这一法语区机构协作的真正愿望。

在巩固已经开始合作和领域中的工作的同时,这两个组织把它们的关系扩大到新部门也是非常可取的。这样做的目标是为改善会员国人民的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作出具体和有效的贡献。

我国贝宁自从1995年10月在科托努主办以法语为共同语言的国家第6次首脑会议以来一直担任法语国家集团主席。几个星期后,我国将把这项任务移交给越南。我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在河内举行本组织第7次首脑会议。这将是继续努力在联合国及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的主持下加强我们的特别关系和发起新的联合行动的又一次机会。

因此,这两个组织将能树立新的里程碑,为国际社会向往的富有成效的广泛合作提供基础和模式。

此外,在河内选举产生这一法语组织首任秘书长将是联合国和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关系中的一个新的转折点。这两个组织在其各自授权范围内,必须应付21世纪的各种挑战。

因此,我们完全相信我们这两个组织之间合作的未来和它们能够单独和共同地发挥的作用,以鼓励各国人民本着团结和真正伙伴合作的精神一起努力,实现彻底铲除贫困的目标,贫困现在已使人类社会感到内疚,而对这一目标的纪念今天又象征性地同本次会议同时发生。

姆佩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因为这是我国代表团第一次发言,请允许我表示,我们最热烈地祝贺乌多文

科先生当选主持大会。我们也祝贺他的前任马来西亚大使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娴熟地指导了上届会议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也欢迎选举科菲·安南先生担任本组织秘书长职务。喀麦隆支持他使联合国适应世界上的变化和动荡的不知疲倦的努力。

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已有多年。1978年大会通过第33/18号决议,给予该机构以观察员地位。从那时以来,在其秘书长的推动下,该机构在三大主要方向开展活动,其中包括建立共识的基本任务。

在建立共识的活动中该机构在努力确定一个讲法语国特征的同时,也阐述了一整套共同的价值观念。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在其成员间解释和发展在教育 and 培训、文化和通讯、能源、环境、农业等领域中的多边合作。

在机构章程规定的机构的其他职能中,该机构从事研究、新闻、协调工作,甚至行动方案。在这方面,机构负责帮助各国政府取得充分享有双边和多边合作资源的机会,并设法同在该机构活跃的领域中工作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保持联系。鉴于南方法语国家所面临的无数发展问题以及各行动者在国际合作中提供的手段不太多,机构为自己制订的目标包括确保法语国家得到它们应有的国际组织投资份额,并且通过联合筹资,向它们提供实质性资源。

因此,过去两年该机构和联合国间合作富有成效。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除了已同联合国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签署纲要协定外,还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签署了一项纲要协定。人们也可以提到同联合国人权中心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进行的联合工作,以期相互支持维持和平干预行动;以及同教科文组织举行跨部门会议,以便在文化、通讯和基本教育领域制订共同方法。

我所提到的各项协定表明,在过去几年中,该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之间的关系通过若干协作行动,已经得到加强。关于教科文组织同该机构在文化领域的联系(仅提及一个具体部门),这两个组织正在密切协作落实促进

非洲语言和文化研究国际基金方案。1997年,教科文组织还参加了组织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1993年在阿比让发起的非洲艺术和娱乐市场的工作。

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纲要协定的执行已导致在15个法语国家展开6项联合方案,以促进农业和工业。其中包括支持在中部非洲关税和经济联盟范围内国家建立生产农业设备和工具的企业,促进印度洋国家之间的工业合作,以加工渔业、畜牧业和农业产品;以及举办有关非污染工业项目设计的专题讲座和培训班,教员培训及中小型企业建立和筹资问题培训。

该机构同儿童基金会合作,已在贝宁、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越南、吉布提、海地和其他国家农村地区开展一系列女孩和年轻妇女教育和扫盲方案。

在执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之间协议的过程中,开展了若干项目。这些包括在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范围内在老挝的一项支持中小企业的方案,在多哥建立一个网络,收集、处理和传播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互联网络信息。该合作机构还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举行了若干次关于人权问题各个方面的研讨会。此外,这两个机构秘书处之间的磋商和对话也增加了。最近的这类讨论涉及到现时问题,包括中非政治局势的发展以及为和平解决该地区危机而采取的主动行动;对法语国家的选举援助;以及可持续发展和执行《21世纪议程》。

据此,我们应当欢迎联合国与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之间相互补充的活动。原则上说来,我们只能这样做,因为这两个组织是为人类的福祉而工作。因此,让我们希望,它们各种形式的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我国代表团成为第A/52/L.1号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之一,原因即在于此,我们同其他代表团一样,希望该决议草案获得协商一致通过。

乌尔德·德达克先生(毛里塔尼亚)(以法语发言):由于这是我在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上第一次发言,我希望表

明,我很满意地看到根纳季·乌多文科先生主持我们的工作。鉴于他的经验和个人素质,我们相信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将取得积极成果。

1995年10月16日第50/3号决议体现了联合国与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之间合作的制度化,当时,正是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届会期间,而我们这个世界性组织也已走向成熟,今天,需要加强这一制度化进程,即使联合国正在作出巨大努力,以适应变化中世界的需要。

实际上,我们希望,这两个组织之间不断加强的合作将有助于为国际合作奠定基础,使国际合作免于意识形态对抗并有决心迎接其所面临的全球挑战;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强民主和尊重人权,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考虑到环境保护的需要,与毒祸作斗争,促进性别平等。

幸运的是,在所有这些领域,联合国的活动都得到了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的支持,后者正在追求同样的目标,并维护同样的和平、合作与民族之间理解的理想。

该机构是1970年3月20日基于使用法语作为共同语言的所有国家的计划而设立的,目的是显示一种新的团结精神,一种通过各个文明之间不断进行的对话促进人民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因素。许多年来,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一直在开展活动,与此同时,充分尊重其每一成员的个性,并积极参与全球对话。

从1992年里约到1997年的纽约,经过北京和其他地点,它积极参加了导致通过各种行动纲领的讨论,同时,它还支持其成员参与这些会议。使用法语作为共同语言的各国的国家元首,在这一法语社群中走到一起,决定与作为联合国大家庭成员的所有机构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从而强调了联合国与法语运动之间存在的相辅相成性质。这具体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第八和第九章,该两章鼓励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创造实现稳定和福利的必要条件,确保在各国之间建立稳定和友好关系,以利维护和平与安全。

在这一方面,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通过在与联合国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促进其成员之间的多边合作,为法语社群

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些领域包括发展权和民主,教育和培训以及能源、科学信息和环境等关键领域中的技术合作。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一向在对话和友好讨论的基础上制订其政策,它非常高兴参与一项有助于国家和民族之间理解的普通行动。

毛里塔尼亚既是阿拉伯国家,也是非洲国家,有着丰富多采的文化遗产,我国认为,它有义务积极参与这样一个组织的活动,该组织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倡导为其全体成员的利益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以维持和平与稳定。

我们很高兴成为提交大会的第A/52/L.1号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原因即在于此,我们希望该草案将获得协商一致通过。

拉武-阿基先生(瓦努阿图)(以法语发言):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就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题为“联合国与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之间的合作”的报告向他表示祝贺,该报告载于1997年8月27日的文件A/52/299和1997年9月16日的增编1中,目前正在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22下加以讨论。

在瓦努阿图共和国的领土上,可以清楚看到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在三个领域的活动:第一,可再生能源领域;第二,美术和初级教师培训;第三,法官培训。

我们首先谈谈可再生能源领域。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在以法语作为共同语言的国家的积极参与下,目前正在瓦努阿图执行一项宏大的小学太阳能发电方案。该方案的一些要点正在按照秘书长前述报告第14段实地执行。文化和教育合作机构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间也在联合开展活动。

小学法语教师在河内的亚太区域局接受培训。

最后,在瓦努阿图共和国,说法语的治安法官目前在共和国以外接受培训。根据与该机构达成的协定,我国政府盼望在总部位于瓦努阿图的南太平洋大学的现有合法培训制度内为这些治安法官设立培训机构。

瓦努阿图共和国支持联合国与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之间的合作,并为自己成为由法兰西常驻代表推行的、题为“联合国与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间的合作”的第A/52/L.1号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之一感到高兴,我们希望大会将一致通过该草案。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大会1978年11月10日第33/18号决议,我现在请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的秘书长让·路易·罗伊先生发言。

罗伊先生(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以法语发言):联合国追求的和平、安全和发展的目标正是政府间法语组织的创始国于1970年在尼亚美描绘的法语区项目的基础。自那以后存在的二十七年中,它已成为显著的民主和法治普遍价值基础上的进一步的真正动力。它将在欧洲、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四亿多人组成一个共同体。

我们的共同体在精神上、文化上和语言上包罗万象。但它已经逐步规定了作为可持续发展条件下法治的共同体团结的成分,二者不可分隔。

从1986年以来的两年期会议中,在(世界上每四个国家中就有一个)采用法语为共同语言的国家中,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曾多次认识到多边主义在新的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并坚定了他们为帮助寻求解决全球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意愿。他们希望与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一道,建立在具体目标基础上的这种新的伙伴关系,这种新的伙伴关系今天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本着这一精神,联合国内的法语国家—其中几个在辩论中已发了言—曾在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上提出寻求纳入一个新的方案的主动行动,从而导致了一项决议:呼吁联合国和该机构两组织为有利于整个国际社会和特别是法语国家的和平和发展而集中它们的人员、技术和财政资源以寻求更紧密的合作手段。该决议特别提到两组织的成绩,并谋求指明出路。

正如几位发言者所特别提到的,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按照要求越来越靠近联合国,特别是一连串长期、重要的国际聚会引导了我们所有人,从在本会议厅召开的世界儿童

问题首脑会议,到几周前也在此召开的里约加五会议、再次在里约开的会议,维出纳世界人权会议,巴巴多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会议,东京非洲发展问题国际会议,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最后是刚刚在罗马召开的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国际公约的缔约方首次会议。在每次会议上,该机构及其法语区伙伴国紧跟联合国,并增进它的努力。我们已寻求确保所有法语区的国家参与这些国际会议在各个阶段的筹备、召开和后续行动。

我们除了倡议这些会议外,还尝试寻找出联合国系统之间在现场特有的协同作用。法语区的合作具有具体、实用和明显行动的强烈愿望的特征。我们对许多国家在引述我们机构诸多方案以及自己国家地区的发展时提到这一点感到高兴。就我们而言,合作就象投资。我们需要看到我们的投资在谋方面的回报。因此,我们与联合国系统在各种实际情况下建立了特有的目标和协同作用。正如许多发言者忆及到的,我们首先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在教育领域合作,将我们的联合行动的中心放在一箇言之,很清楚,主要是在文化领域的一基础教育,远距离教育和信息技术上,以寻求象在1993、1995和1997那样,与非洲技术和娱乐三个市场在文化和经济上结盟。

同样的想法也适用于我们与联合国工农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的关系上,双方于1990年签署了框架协议。正如几位发言者所忆及到的,它寻求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组织在工业管理、维护和研究中扎实的训练,并支持便利管理企业、可行性研究及促进投资。特别在与通讯相关的技术领域及联合国秘书长报告中所提到的其他领域内,这是主要工作。

这些就是1995年人人提及的那份决议—第50/3号决议—通过以前两个机构间的合作成果。在自此以后的两年中,本着以上所提及的精神,特别是在法国常驻代表的努力下,我们将相当多的资源与联合国的资源汇集在一起。今年6月,我与科菲·安南先生就加强联合国与合作机构的合作签定了一份协议。该协议综合了1995年10月和1996年10月与联合国儿童基金执行干事卡罗尔·贝拉

米夫人所签的协议以及1996年10月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干事斯佩恩先生所签的协议。在每一情况下,协议的目的是要为某一国或某个区域或一些国家的具体活动汇集两个机构的资源。最近,在日内瓦,我还有幸地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代理署长签署了一份重要的协议。该协议支持在加强法制、推动和保护人权、巩固民主以及其他方面采取共同行动。

在我们提议下,9月29日,在我们位于巴黎的总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是联合国处理竞选援助、维持和平与巩固和平以及支持法制的官员。我们以展开的共同活动使我相信这一会议将在这些最为基础的领域为新而又更高层次的合作铺平道路。

放在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与合作机构合作所取得的令人鼓舞的进步,并包括了许多我们能在今后探讨的重要的合作领域。它还表明——我们经常需要这样做——在世界事务中多边主义的成果。我希望第50/3号决议所给予的动力能够保持、巩固和发展。与众多已经发言并是这份决议草案提案国的代表团一样,我们国家和政府首脑在多种场合都表达了这一愿望。

我希望倾听我们所属法语国家与联合国合作的法语代表团和其他地区的代表团将接受我的致谢。我感谢它们今天早上对合作机构工作和成绩所发表的善言,以及它们对联合国与法语集团合作机构合作的加强所给予的积极支持。我肯定11月14日至16日在河内召开的有法语联系起来的第七届国家与政府首脑高峰会议上的工作和决定将加强这两机构间的合作。

我对联合国机构中的男士和女士们致以我最热烈的谢意。他们使大会第50/3号决议宣布的纽带具有意义、方向和内容。该项决议呼吁联合国和合作机构汇集它们的资源以巩固发展所需的和平条件以及满足平等但不同的生活在一起的这种普遍需求。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将对第A/52/L.1号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我请秘书处的代表发言。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大会及经社理事会事务司司长)(以法语发言):如果大会通过第A/52/L.1号决议草案,将不会有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第A/52/L.1号决议草案?

第A/52/L.1号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52/2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可否认为大会愿意结束对项目22的讨论?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46(续)

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结果的执行

秘书长的报告(A/52/305)

萨姆汉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很高兴代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团与先前几位发言者一起对秘书长就实施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的结果所提出的综合报告表示感谢和敬意。报告中所包含的具有价值的内容将在讨论中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我还想对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就该项议题发表声明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表示支持。

我们对哥本哈根首脑会议的结果的审议表达了国际社会处理国际环境中社会想象和急速变化的意愿。这些现象与变化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枝节问题影响着全社会。

国家与政府首脑欢迎《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及行动纲领》并表达了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个人福利的重视。他们还审议了与该问题有关的各种因素。但是,由于越来越大的社会与发展挑战以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间越来越大的经济和社会差距,担心和忧虑继续给世界环境蒙上了阴影。这大大地导致了普遍的贫穷、文盲和失业。

最近,一些统计数据显示,全世界有1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得不到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例如粮食、饮水以及保健和教育服务等。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声明支持《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将它视为提高国际和国家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并将促进采取共同办法遏制日益增多挑战的新机制。

与此同时，我国重申需要促进以共同的认识为基础，在一个广泛的构架内开展广泛全球和区域合作，以解决各种社会、经济和发展问题，确保对人权和其他基本自由的保护。

各种社会发展形态与区域和地方武装冲突、非法贩运毒品和有组织犯罪及暴力增多之间的关系使解决社会问题的难度加大。这些挑战实际上超越了国界，而成为全球性问题。没有合作和相互协调，无论是双边、区域还是国际一级的合作与协调，各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单独处理这些问题。因此，我们重申，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提供支持并继续作出集体努力。

目前同样迫切需要促进开展联合努力，以实现发展，解决捐助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继续减少的问题。所有这些因素继续阻碍旨在落实发展和社会改革的各种战略和方案的实施。

在这方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认为，与家庭有关的问题——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的福祉——以及保健和教育服务变得日益重要，这是由于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持续存在发展领域的种种挑战。因此，我们呼吁开展一致的全球努力，建立一个公平与公正的国际环境，以实现人类和平、安全、稳定与发展的理想。

与此同时，我们支持社会发展委员会提出的目的在于增加生产性就业、减少失业和在可持续性及其公正基础上毫无例外地改善社会所有阶层的社会服务。

我们希望，将尽力确保定于2000年举行的审查和评价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实施情况的大会特别会议取得成功。

在这方面，我们要再次重申，必须加强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发展组织的作用，以便尤其在社会、经济和发展领域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依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家元首谢赫扎耶德·伊本·苏丹·阿勒纳哈扬殿下的指示，我国实施了各种发展政策和措施，它们与国际和国家形势变化相协调，而且与我们源自宽容性的伊斯兰教教法的信仰、习俗和传统相一致。

作为为实施哥本哈根首脑会议成果所作努力的一部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制订了新的立法，并改变了它的一些社会经济发展制度，以实施目的在于开发人力资源的宏伟发展方案和教育、保健、文化及培训方案。它还拨出必要财政和心理支助资源实施各种培训方案，帮助老人和残疾人获得康复，以确保他们能融入社会并有效参与发展方案。

我们也集中力量使私营部门逐步参与对地方人力资源的培训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政策和方案的实施。我国向所有男女公民提供就业机会，以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采取新的科学方法管理他们的日常生活。

我国深信，需要把经济目标同包括人和文明层面的全面社会发展目标挂钩。作为这一信念的体现，我国继续发展农村地区，通过更新改造广阔的公路网将它们与城市连接起来。此外，我们还在全国所有地区提供电、饮水和可接受的住房。我们继续制订社会照顾方案，以使我们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水平实现质的飞跃，并促进和加深社会及家庭融合概念。

我们的努力并不局限在地方一级，而是扩展到与各种区域、双边和国际发展方案的合作。我国参与了一些发展中国家若干社会项目的实施和筹资。它还向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软贷款，使它们能够应付公民在社会服务领域的基本需要。

我们参加了社会和发展方面的各种社会努力，举办了关于社会问题、环境、人口和其他与发展有关问题的许多会议、讨论会和培训方案。我们期待着参加定于明年8月在里斯本举行的主管青年事务部长世界会议。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国际社会将作出努力应付挑战，以实现《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所载的全面目标。

叶利谢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过去十年以数个重要全球性会议为特征,其中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尤其重要。自那时起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我们有好的理由指出其后续活动未达到我们的期望。

因此我国代表团十分希望全面审查和评价哥本哈根首脑会议成果执行情况的2000年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将是评价国际社会能否正确和充分回应当今主要社会挑战并履行其《宪章》承诺的主要考验。

在特别会议筹备工作中,会员国政府应通过加紧消除普遍贫困、消灭赤贫、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的努力,并通过在本国深化社会融合的方式务实地表现出其政治意愿。

乌克兰总统在1996年3月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中提出了我国在国家一级为执行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各项决定采取的措施。随后,颁布了关于乌克兰国家行政权力机构执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最后文件的主要活动趋势的总统命令。乌克兰政府最近设置劳工和社会政策的副总理职务,设立家庭和青年事务部,并通过了一系列方案文件,这些都进一步证明乌克兰社会政策及其国际承诺的连贯性。

乌克兰政府继续将其努力集中于青年和老年人问题、以及国际家庭年、消灭贫穷国际年的后续措施以及1999年国际老人年的筹备工作。在消灭贫穷国际年方面,乌克兰政府确立了监测贫穷并收集和审查与其根源和各种表现形式有关的数据和信息系统。

今天,10月17日,我们纪念消灭贫穷国际日。根据统计报告,目前逾13亿人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20多亿人的境况仅略微好一点。这是联合国应十分严肃对待的令人不安的情况。我们可能记得,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与会者承诺把消灭贫穷的目标作为人类道义、社会、政治和经济大事。在这方面,我们支持新设立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旨在援助执行首脑会议后续行动的活动。我国代表团还愿欢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其它有关机构在支持国家除贫战略方面的联合努力。

目前联合国正在经历复杂的改革进程。现在是时候

了,本组织应该变革并更有力地回应永远变化的世界的新挑战。我们认为,尽管有某些缺点,秘书长改组联合国结构和方案活动的建议,尤其是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建议,应该得到我们的充分支持。我们深信,联合国应不仅继续着眼于加强社会 and 经济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而且它应是这种活动中的带头人。

我国代表团还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活动的振兴,它被赋予监督执行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决定的基本责任。

委员会上届会议工作的新形式产生了相当积极的结果,包括通过关于重要问题如生产性就业、国际老年人、国际家庭年后续措施等数个建设性和平衡的决议。我们鼓励联合国秘书处继续执行进一步促进发展委员会新型活动的措施。

最后,我被授权在此声明,乌克兰重申它充分致力于在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承诺的各项义务。我国准备积极和建设性地促进全面审查和评价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执行情况的大会特别会议筹备工作。

马比兰甘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在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筹备过程中,菲律宾主办了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第四届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发展部长级会议,它产生了要求在2010年消灭贫穷的《马尼拉宣言》。

今年11月5日至11日,菲律宾将再次主办亚太经社会第五届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发展问题部长级会议,在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范围内审查亚太经社会区域在执行《社会发展行动议程》中取得的国家进展和采取的区域行动。

去年,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亚太经合会)成员国18位经济领导人聚集菲律宾,召开了第四届亚太经合会首脑会议,他们在那里商定加强太平洋区域内经济合作主动行动。亚太经合会领导人的《苏比克宣言》把诸如人力资源开发、妇女和青年等社会发展问题纳入亚太经合会的关切。

关于青年的议题,菲律宾欢迎葡萄牙提出于1998年8月里斯本主办第一届世界青年部长会议,我们认为这将是评价青年的行动纲领,并制订未来方向的良好时机。

根据其国际承诺,菲律宾在菲德尔·V·拉莫斯总统的领导下加紧执行《社会改革议程》,这是菲律宾社会发展的蓝图。

1994年制定的菲律宾《社会改革议程》得到了有效扩大,以改善普通人的生活,并确保他们获得赋予他们尊严、希望和选择的权力的生活质量。它提供具体、跨部门、有时间限制的除贫战略,重点在于三个主要议程,即获得高质量基本服务的机会,获得生产性资源和资产改革的机会,以及建立机构和参与管理。

菲律宾以充分就业为目标,已经开始进行全面的就业战略方案,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和生计机会,促进劳工阶层的权利和福利并以新的方式培养准备迎接全球化挑战的具有竞争力的职工来加强人力开发。

菲律宾感谢秘书长关于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的报告(A/52/305),菲律宾认真研究了这一报告和关于联合国第一个消灭贫穷十年的报告(A/52/315)。

从秘书长的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许多国家已经作出认真努力,执行社会问题首脑会议的成果。我们应该鼓励将各国为执行首脑会议所单独进行的活动通报给国际社会的这个进程,以使我们能够分享经验并相互学习对方的经验。在这方面,社会发展委员会应制订适当的报告格式,这种格式将确保更好地评价执行首脑会议具体成果的国家活动。简单概括有关的国家活动是不够的。这些活动应根据首脑会议的具体建议进行分类。

同样,我们希望获得同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和捐款界的作用有关的关于首脑会议具体执行情况的有组织和连贯的数据。

资源问题当然是执行成果方面的一项中心关切。除非各国具有所需的资源,否则社会问题首脑会议的成果便

会成为采取行动的遥远蓝图。当然各国本身负有维持社会发展提供资源的主要责任,鉴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各种经济和结构上的限制,它们已经竭尽全力。

社会问题首脑会议强调同包括捐助界在内的其他发展角色阶层伙伴关系以合作的做法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方面仍然对增加官方发展援助抱有一些期望。然而发生的情况确是相反的。在过去五年中官方发展援助不断下降。必须认识到官方发展援助是全球伙伴关系处理全球优先的社会关切(诸如根除贫穷)所必需分担的费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更不用说这种外国财政资源对许多缺少资本的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都是关键的。

秘书长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7年实质性会议上的报告(文件A/52/203)中提到为全球商定的承诺和优先事项筹措资金的创新设想。该报告就结成公营—私营伙伴关系动员资金以实现发展目标提出了若干发人深思的建议。我国代表团认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再次过问这一主题,因为当时它没有充分的时间考虑这个问题。

我国代表团还认为社会和发展委员会本身必须研究为响应社会问题首脑会议所进行的各项活动引发或动员资源的各种可能性。例如,尽管我们同意社会发展委员会下届会议将重点注意诸如促进社会一体化、加强社会保护、暴力、犯罪和非法贩毒问题等主题,但是它也可以对为响应社会问题首脑会议成果所进行的具体活动的财政需要和从何处找到这种财政资源提出更好的想法。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现在正在进行计划为2000年的特别会议早日进行筹备工作,以便全面审议和评估执行社会问题首脑会议成果的情况。我们支持这一建议,即: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设立整个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在1998年尽早举行该委员会的组织会议。

为确保在2000年十分成功地审议和评价社会问题首脑会议的成果,至关重要是尽快开始进行实质性准备。还必须安排除文件A/52/305所提及的那些活动之外的各项活动,这些活动涉及非政府组织、学术和研究组织、企业界和文明社会其他成员的参与,它们将支持导致在2000年召开大会特别会议的这个进程。

在我们赞扬自从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以来迄今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之时,我们无论怎样强调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有多么艰巨都不会是过份的。国际社会必须表明它们对付这个挑战它必须能够显示必要的政治意愿并提供为充分执行首脑会议成果所必需的资源。

卡梅拉诺女士(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哥伦比亚完全同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决定由社会发展委员会进行执行哥本哈根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我们祝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认真态度实现这项决定,这点可从以下情况看到:多年工作方案、对专家开放就有关问题的讨论以及强调起草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执行首脑会议的各项建议。

根据第51/202号决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成为1997年4月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后续行动的第一次区域会议的提案国。哥伦比亚参加了那次會議并对起草《圣保罗协商一致意见》作出了贡献。

在评价哥伦比亚在同首脑会议基本主题有关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时,我们发现埃内斯托·桑佩尔总统领导的政府所推行人们称之为“社会跃进”的社会政策和《哥本哈根宣言》的宗旨是一致的,并赞同宣言制订根除全球贫穷的政策和方案的目标。

我们已经将“社会团结网络”作为我们社会政策的一项根本因素。将这构想为改善哥伦比亚社会最脆弱阶层生活质量的一项文书。1994年和1998年之间的社会开支提高为总额的41.8%,而前一个四年期则是36.9%。拨出主要预算资金用于基本教育、保健制度和团结网络下属的方案,其中突出的是同文艺和福祉有关的方案以及为发展援助原居民和哥伦比亚危机人民的发展的国家战略,这涉及这些种族群体的社会融入的方案,这些方案将它们同国家社会 and 经济发展项目联系在一起。

哥伦比亚赞成这一看法,即我们应通过对居住在贫穷中的人提供贷款和提供低价住房以促进国家对社会发展的主动行动。

根除极端贫穷是哥伦比亚发展计划的一项目标,这是

政府政策和行动的首要目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哥伦比亚欢迎大会有关将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结合在一起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各项呼吁。

哥伦比亚认为,国际社会对社会发展提供援助的财政倡议和活动、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非常重要,发达国家应该拨出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作为官方发展援助的呼吁也非常重要。同样,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该承诺实施20/20方案以制订基本的社会方案。将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拿出来也是筹措资金从事发展的又一个途径。

多边债务是影响许多贫穷国家的经济、妨碍其经济发展,使之没有足够的资金从事社会和人的发展的沉重负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承认最贫穷、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认为自己难以实现所作的承诺、特别是多边承诺,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是,这些机构同时却承认在41个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有无法承担的债务,12个国家负债沉重。

毫无疑问,作为开发筹资的一部分,外债将继续是全球财政、经济和政治的主要问题之一。但是,如果我们实行已经开始的变革或是债权国和债务国政治决定中可能的变革,我们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向就能够有所改变。

发展中国家只是从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内部节余中得到资金来源,为教育和预防医药、治疗医药方面的社会基础设施提供基金。外国资本,无论是通过外国信贷还是外国投资,都没有为社会项目提供任何的资金。关于向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部门提供资金,哥伦比亚赞同多伦多大学一位教授杰拉尔德·黑莱纳最近在第二委员会发言时表达的观点。他建议世界银行在教育 and 预防医药、治疗医药领域的社会基础设施信贷应该提供项目开支的50%以上的资金,世界银行应加强在培训设计和执行社会方案方面的合作。

事实上,在处理极端贫穷的人口时,哥伦比亚改变了共同筹资比例,仅仅要求5%的投资,其余95%来自为此目的成立的国家机构的贷款。

加强对项目金融管理的内部控制十分重要。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有关成果的报告不仅能够提供金融投资的数目,而且能够提供实际进行的项目方面的真正资料、他们的质量以及受益人口数目。

国际技术合作资源有所减少。向市场为基础的开发迈出一步的同时,是努力把国际开发合作的负担转向私营部门。如同不结盟国家在卡塔赫纳首脑会议上那样,哥伦比亚在这里重申国家在开发和在国际开发合作中的作用。

正如不结盟国家在卡塔赫纳同样认识到的,冷战后时期为国际经济合作提出了机遇和挑战。为处理开发,同时集中关注经济增长和消灭贫穷,发展中国家之间应该进行更多的协调以便加强行动的能力,以综合的作法处理新的问题。我们不能接受利用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障人权和投资等问题限制发展中国家进入市场或得到援助和技术的企图。

发展中国家消灭贫穷,实现经济社会进步和争取持续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的斗争,是建立更加生气勃勃的有利经济环境必不可少的前提。

哥伦比亚完全赞同大会决议的两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必须在经济、社会和相关领域的重大国际会议的协调的后续行动架构内以综合作法对待执行首脑会议结果的问题。同样,必须指定国际劳工组织在就业领域采取行动,这对于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极其重要。

阿尔希提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欢迎秘书长关于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尤其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社会 and 经济发展问题。这种趋势无疑是正确的、恰当的,鉴于发展和国际安全与稳定直接相关,它要求所有各方增加道义和物质支持和参与。发展问题不仅仅是第三世界的问题,而是世界所有国家的问题,因为由于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好处增进了稳定和 International 安全,毫无例外地有利于世界所有的国家,保证了和平和安全的环境。这反过来对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因此,贫穷、饥饿和欠发达的循环就可以被打破。代之以把所有人类和谐地带向更大发展、进步和繁荣的循环。

在这里强调一下我们都熟知的老生常谈或许是有益的,即:不有效地投入所有物质手段和人力资源,就不能实现发展。关于物质手段,由于我们近几十年经历的北方和南方经济不平衡的结果,国际商业关系目前已到达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南方很大一部分人口被债务、贫穷和欠发达压得喘不过气来。此外,北方和南方在技术发展进步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带来严重的问题,妨碍南方国家的发展。相反,发达国家正在积累财富,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和资源。所有这些因素单独地和共同地使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发展更加恶化了。

在人力资源发展方面,局势如同物资手段方面的局势一样严重,因为文盲、贫穷、饥饿、疾病和歧视继续在许多国家蔓延。这种局势给发展带来十分消极的影响。

关于伊拉克执行哥本哈根决议建议的情况,我很遗憾地向大会报告,我国由于遭受经济制裁而无法执行任何建议,同样,有必要重新审查许多无疑妨碍——如果不是完全阻止——发展的消极做法。

我们谨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即联合国某些机构起了消极作用,它们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实行经济制裁,使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和人民受到全面的不利影响,从而阻碍或甚至阻止了这些国家的发展。

我们并没有编造这些问题。秘书长在他的报告“和平纲领补编”中详细地谈论了制裁问题:

“它们可以与联合国的发展目标相冲突,并使对象国家的生产能力遭受长期的损害。制裁会使对象国家的邻国或主要经济伙伴遭受严重的影响。”(A/50/60,第70段)

我还谨提及大会联合国施加制裁问题工作小组最近的报告,报告中建议对国家实行制裁时应严格而谨慎。工作小组建议,只有在用尽了解决争端的所有和平手段后才诉诸制裁,对伊拉克并没有这样做。该小组强调必须确定

实施制裁的条件、取消制裁和制裁期限,并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对象国家的平民与发展。对伊拉克也没有这样做,对我国实行了一种没有规定期限的无限行动权的封锁。秘书长的专家格拉萨·梅切尔夫人在去年向大会提交的关于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的报告(A/51/306)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近几年来不受限制的使用经济制裁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联合国宪章》在关于制裁的以下方面有严重的缺陷:制裁的应用和范围;制裁对对象国家的发展和人权的影响,包括获得食物、医药、教育和就业的权利;减轻或取消制裁的机制。这些缺陷使安全理事会某些国家把制裁这种本来只有为了解决国际冲突在特殊情况下才使用的措施变为一种报复工具,用来使人民挨饿、阻碍他们的发展方案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使他们的发展倒退。

稍微审查一下这些制裁的性质就可以看出在多大程度上实施了这些制裁剥夺了伊拉克人民最基本人权以及他们的发展权利。例如,制裁委员会拒绝使伊拉克有权购买轮胎、儿童的铅笔、救护车或净化水产品,因为一个委员会的成员声称这些基本必需品会加强伊拉克的基础设施,并且可以用作其他用途。这就好象他在说他的国家不希望伊拉克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结构,他的政府希望摧毁我国的经济。我们扼要的讲,我们认为制裁以及实行制裁的方式使人们对本组织的信誉、其伦理准则以及其《宪章》的精神和规定产生了疑问。制裁是一种不人道的和没有效力的工具,因为那些诉诸实行制裁的国家——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这样做是利用联合国来达到它们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与本组织在促进国际和平、稳定与安全以及各国之间富有成效的合作方面的目标是不相符的。

很快地看一看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以及国际和非政府机构的报告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封锁已对发展特别对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毫无疑问制裁造成的消极影响已远远超过了可能获得的任何好处。各种数字和统计数证明了这一点,表明由于经济封锁的直接后果而死去的人数是轰炸广岛中死去人数的5倍。因此,封锁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更不要说国家的发展受到阻碍、教育制度恶化、文盲、普遍的贫困和饥饿。

这个摧毁进程是对伊拉克人民进行的有预谋的种族灭绝,因此这种做法违反了《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以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例如,最近的统计数字表明,今年6月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人数超过了4 434,而1989年只有593人,5岁以上儿童的死亡人数超过6 460,1989年只有1 685人。

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问自己,联合国的各种机构是如何处理一个遭受没有任何道义或法律基础的过时的决议之害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索马维亚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荣幸而愉快地代表智利就议程项目46“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发表意见。首先我谨表示我们支持坦桑尼亚代表77国集团以及巴拉圭代表里约集团关于这个项目所作的重要发言。

此刻我谨概述自举行社会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并展望未来、哥本哈根+5、将在2000年举行的大会特别会议,以评估载入《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各项承诺,并进一步发展这些承诺。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阶段展望不远的未来?首先,因为只有我们头脑中有明确的长期基本目标,才能确保执行首脑会议的方式符合在哥本哈根实际商定的方式。第二,因为里约+5——尽管在高级别参与方面以及在被联合国确认为处理环境问题的国际论坛方面是出色的一并不象我们许多人希望的那样成功。这是因为我们基本上重复了5年前在里约采取的做法——重新就已经商定的文件的案文进行谈判,或只是重复过去已使用的语言。

哥本哈根+5绝不能再发生这样的情况。举行大会特别会议时正好是第21世纪的开端,在这届会议上我们不能使自己陷于再次就已经作出的承诺进行谈判。我们而应利用这次机会以具有完全创新性的方式纪念首脑会议5周年。

我认为可以计划举行一次不同例行会议的特别会议,它将把注意力集中于通过一大批旨在执行首脑会议成果

的重大倡议——即面向行动和有关执行的倡议,并集中于有关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采取具体行动而不是有关案文的谈判。我要告诉大家我对一次关于具体倡议的会议应是什么样子的想法。

首先,这样一次会议理想上应具有聚集以下所有实际角色的能力:各国政府、议会、政治党派、劳工、企业、银行、金融机构、公民社会组织、宗教领袖、市长、地方领袖、以及媒体。我们必须利用其想象力及集体责任感。如果我们真正要执行哥本哈根文件,那么它们每一方面都将需要发挥重要作用——不仅仅必须确定框架的各国政府,而且是具有在其活动级别实现首脑会议各项目标的方法与工具的单独角色。

我们必须记得社会问题首脑会议是一次具有很多平行活动的政府间会议,这是组织这种会议的传统方法。但我想看到举行一次聚集所有这些其他角色的大会届会,以便它们也能够在其各自的活动范围内推动和采取倡议。换言之,联合国应提供一种空间,使整个社会能够以其自己的项目而分担执行社会问题首脑会议成果的工作。我们必须象我们对待世界首脑会议那样,要有抱负,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我们认为难以实现的目标。

我想在这样一次会议上看到世界上各种社会角色大规模的聚集,一道为一个中心问题——即人民——而努力。只有联合国能够做一点。哥本哈根首脑会议是历史上国家元首的最大一次聚会,我们为什么不能为社会角色做同样的事?

我要谈谈2000年特别会议可以促成的一些倡议。首先,我们可以制订一项旨在消灭贫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我们在首脑会议的筹备过程中讨论了这一点,但很多人感到它尚不成熟,而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消灭贫困的政治承诺。这种承诺已随着《哥本哈根宣言》而实现。这一世界范围的承诺已经提供了一种号召力,现在我们必须进而使之在实际的时间表内变为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二,我们能够确保各基层社区的整体发展。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世界上最需要帮助的20%的社区,根据它们自己确定的需求而有目标地采取行动,从而消灭赤贫,在

当地创造就业、刺激小额信贷、消灭暴力、建立医疗中心、并满足社区一级的其他基本需求,这确实是完全不可能的吗?简言之,我们必须解决影响生活在边缘地带的人们不同基本问题。这些是需要在地方法和城市一级以及在国家一级处理的问题。在这方面,地方当局的承诺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在里约+5会议上所强调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非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补贴。我们必须研究目前充满前后矛盾和异常现象的财政制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刺激。我们必须理解当今财政制度的真正影响,否则我们将无法利用它为整体发展提供刺激。我们需要“友好的”财政制度来创造就业并照顾环境。

第四,我们必须制订利用私有资本作为健康的企业而不是慈善活动来满足社会需求的新的方法。必须指出,企业部门积极参加了世界首脑会议的进程。我们必须承认,关于私有资本能够为满足社会需求提供货物与服务概念,对那些习惯于想到用于这种目的的公共开支者来说,一直是陌生的。私营部门在传统上也认为该领域的投资属于公共部门的范围。我认为,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机会——不是只奖励私营企业捐献其一小部分利润用于社会目的。适当的方法是应在自愿的基础上做到这一点。我想到的是鼓励产生利润的商业投资,但这种投资也要提供货物与服务来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在这一议题上必须进行进一步审议,各方必须准备以创造性方式加以研究。智利在预防性社会行动领域中具有成功的经验。

第五,显然需要建立某种关于创造更多和更好工作机会的世界范围的合作。创造就业必须是经济政策核心。我们有资金,但却缺乏意志和决心。如果我们想使人成为发展的中心,工作机会就必须是经济的中心。我们必须协调我们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社会政策。我们必须认清,各国无法在使其人民生活不稳定的同时实现经济稳定。

幸运的是,我们逐步超越了那种于1980年代所奉行的结构调整政策,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包括联合国各机构及在世界首脑会议上的很多方面的大量批评。但我们仍需要一种国际协商一致意见,即只有创造更多和更好的工作,才能使我们实现首脑会议的目标。工作机会可在减

轻贫困现象并促进社会融合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是首脑会议上的另外两个重要问题。

第六，关键的是要制止国际合作的下降趋势。我们当然知道，最富有国家正在其经济及公众舆论方面面临内部问题，或许它们的援助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如此慷慨或无条件。诚然，也出现了一些错误，而这种援助也并非一贯得到适当的利用。但我认为，这不是要点。真正的要点是：鉴于现代经济关系的结构，我们无法指望各国将仅依靠私人投资实现发展。

当然，这可以在许多情况下，但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成为人们沿循的道路。在保护主义日趋严重之时削弱国际合作并期望这样做会确保世界稳定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说服北方国家大众舆论，议会和媒介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国际合作是世界稳定的战略因素，而不是是否愿意提供资金问题，也不是国家需要问题。这是一个关键成份，因为应该把它专门用于否则就无法满足的具体需要上。

正如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哥本哈根宣言》所确立的那样，各国都有实际社会问题，但北方国家不能以孤立政策实现其谋求的稳定。然而，合作主要是一政治问题。它不仅仅是通过决议，而且还要团结，准备采取实际步骤实现合作的各角色。

第七，我们迫切需要制订团结第三世界各国的主动行动。首脑会议进程在这方面非常具有决定意义。它大大强调承认非洲特殊状况和我们必须对非洲和欠发达国家作出具体承若。就此达成协议并非轻而易举，但其它地区的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对这样区分和分割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感到关切。在我看来正相反，我们自己应该对第三世界适用我们期望发达世界对其适用的同样原则和价值观念。如果我们不准备承认我们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并因此支持它们，我们就不能真正期望发达国家对整个发展中世界采取同样立场。我要表明，30个最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我们如何给他们下定义，都已着手制订主动行动，声援其它发展中国家执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成果。第三世界树立榜样比任何行动都会更有利地在国际一级巩固变革认识，比任何象征都更明确地

体现处理这些问题的新办法。

最后，我们可以在首脑会议和其他国际会议经验基础上，评估民间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对他们的影响。哥本哈根会议尤为如此。但是，各民间社会组织的整体问题是，各组织都按部门划分：即主要涉及妇女问题的妇女组织、有关环境的生态组织、有关人权的人权组织等等。这些组织之间有一些跨部门联系，但尽管作出各项努力，它们仍趋于掌握片面情况，并很少合作。

另一方面，有些社会角色在当今经济中发挥着所谓体制作用，但绝大部分都没有组织起来。我们可以谈及让私营企业为社会发展服务，其最大好处是双方均获益，但归根结蒂，企业能够有收益是因为有人消费其产品。投资同积累一样也是关键。私人投资赚取财富的能力至关重要，因为没有创造财富就没有任何分配。但是，这一进程反过来也取决于消费市场成品的个人。

因此，把我们所有这些消费者组织起来——就象工会工人过去为捍卫自己利益组织起来那样——似乎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我在此主要集中阐述这样一个事实，即民间社会各部门的工作仍彼此毫无协调，建立我们在大会考虑成立的某种论坛将是一项重大目标，其目的是创建民间社会大型全球框架，把所有这些不同部门相互联系起来，并就共同问题确立高级议程共同采取行动，社会问题首脑会议的诸多问题：即消灭贫穷、充分就业和社会融和——显然都是该共同议程的一部分。

最后，就以首脑会议为起点实施各项具体倡议而言，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支持的各学术中心可以集中对阻碍执行《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的重大障碍进行研究。

最后，那些不断批评的人可能会说，这些意见都不错，但实质上什么都不会改变，情况将仍同现在一样，因为国际社会不准备抱着对未来的幻想工作。这就是他们要说的话。但我要忆及，有人恰恰在人们五年前着手组织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时说过这番话。当时的论据是社会发展不是国际问题，很难使发达国家对这一进程作出承诺，会议将再次以南方要求北方分配资源的典型呼吁结束

——即一系列现由表明首先为何不应召开社会问题首脑会议，其次会议如果召开就将失败。实际上，社会问题首脑会议具有政治框架，筹备中的大会特别会议成果也将取决于各方作出承诺和明确确定政治框架。

最后让我表明，每当我预到冷嘲热讽时，我都会想到奥斯卡·王尔德曾说过，冷嘲热讽知道一切行情，但不懂任何价值。有人会认为我有时走到反向极端，而且过于顽固。我准备接受这一点，但实际上，我深深地认为，我们的个人态度和我们国家的态度非常重要，我们总是可以强调各种困难和问题，但我们反过来也总是可以注重以自己力量对付这些困难，并设法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共同克服困难的能力。

有人曾说奴隶制绝不会消失，工会绝不会建立，妇女永远不会投票，人权概念和民主进程绝不会在世界上是得到重申，非殖民化不可能实现，柏林墙将永远屹立，种族隔离不会结束。但这一切都已发生，这是因为人民在遇到困难时不甘气馁，相反他们决定采取共同行动，并保持完整性、信念和价值观念。

这就是我们通过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达成的观点。该进程已导致一个成功的开端，但我们仍要作战。我们应该参加这些战斗，并为此作好计划。没有组织就没有任何远见。如果远见伴之以组织并伴之以通过愿意听取意见和向他人学习达成协商一致的能力，则我们就可以取得进展。根本不同和尊重文化多样性及各宗教传统是社会问题的关键。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愿意和致力于听取他人意见，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如果我们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则我们就必须检查自我——审视我们听取他人意见、同他人合作和达成协商一致的信念、愿望和能力。我们决不能认为今天似乎不可能作的事情明天也无法实现。曾经不可能做到的各种事情最终都靠人类坚持不懈的意志实现了。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大会在1997年10月16日举行的第32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教廷观察员发言。

马蒂诺大主教(教廷)(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正处于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为全面审议和评估首脑会议成果执行情况将于2000年举行的大会特别会议之间。

国际大家庭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级别在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聚集一堂，作出关于发展新观念的庄严承诺，它将人作为其中心。对许多人来说，那是充满希望和期望的时刻，这包括民间社会广泛阶层的代表，他们同各国政府一起建设性地努力审视贫穷、创造生产性就业和广泛社会融合的各种挑战。

我们一定不能辜负这种希望和期望。如果我们带着积极成果参加审议进程，我们将真正大为鼓舞我们人民对联合国系统的信心。如果我们参加审议进程时所取得的进展甚小，或者围绕着我们所作承诺的协商一致意见有所减少，我们便会使希望对联合国处理人民真正问题的能力散布怀疑情绪的那些人得到一种新的武器。

今天，我国代表团要谈三个具体主题，必须在审议会议之前的短暂时间内审议这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贫穷。对许多人来说，社会问题首脑会议被视为“贫穷问题首脑会议”，因为在哥本哈根人们明确承认，有可能在一定的时限内迅速减少和最终消除令人羞辱的极端贫穷的灾祸。存在消灭极端贫穷的手段。各国同意在1996年年底提出明确对策。如果我们无法向审议会议汇报说，在同极端贫困进行的斗争中已经取得明确和持续的进展，我们怎能庆祝2000大庆年，我们怎能光荣地进入新的千年期？

我顺便提一下今天我们正在纪念消除贫穷国际日。我要欢迎约翰·保罗二世教皇为这一场合所提出的呼吁：

“我重申我的呼吁，每个人必须根据他自己的责任致力于消除贫穷的根源。但愿没有任何人对受到生活伤害的那些人保持麻木不仁！教会怀着巨大尊敬和爱心站在被贫穷剥夺了尊严、家庭生活、受教育和就业机会的所有那些人一边。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基督特别偏爱他们。他们等待我们的具体声援。”

我国代表团愿提到的第二个，也是更复杂的主题是社会和经济权利在今天的意义。人权的不可分割性及其普

遍性在过去的一年中,已经一再得到国际社会的重申。这项原则也必须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的时候得到重申。但是,今天还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倾向,这种倾向减少社会和经济权利的意义,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强烈愿望”,并抽掉了它们作为“权利”的特殊性。

这些权利的充分实现将只能是逐步完成的,这一点是清楚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允许“渐进主义”的概念等同于“无限期延长”。在现代社会和经济复杂的情况下,各国政府靠它们自己的力量并不能成为实现这些权利的唯一主角。这些权利的实现除其他外,要求实行这样的政策:这些政策能使市场、私营部门的民间社会以及在地方、区域和国家各级的政府当局进行建设性的合作。然而,在社会中实现这些权利的复杂性一定不能减少它们作为每个个人的权利的意义。在我们谈到营养、教育、健康、住所、工作或发展的权利时,我们真正谈论的是每个个人在道义上的具体权益、他或她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层面。

被剥夺了这些权利,蒙受这种剥夺令人羞辱的影响可能进一步导致以下情况:这个人行使其其他基本权利的可能性事实上大为降低。在人们被剥夺充分享受行使其社会和经济权利的可能性时,他们往往被更广泛地排斥在外,不能充分参与社会。

我国代表团要谈的第三个方面是,可用于发展援助的财政手段,尤其是官方发展援助的危机。对穷国直接投资流量的巨大增长是近几年发展政策中最说明问题的因素之一。发展的未来同穷国吸引这些投资并确保这种投资为其本国人民带来社会发展的能力将是十分密切相联的。

但是,这种流量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它主要流入一小批被认为具有吸引力的国家。如果最贫穷的国家要吸引投资,它们仍然需要大量官方发展援助,以弥补它们的相对不利之处。它们将需要具有良好针对性的援助,以改进其根本基础设施,不仅是有形的基础设施,而且也是人的基础设施--这要通过改进教育和保健来实现--以及社会基础设施--这要通过对法制和管理的结构进行投资来实现。

为什么目前可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资金处于空前低

的状况?的确,在过去这种资金没有得到良好使用,没有产生成果。但是,浪费、贪污和管理不善是捐助国和接受国的政策特点。确实,现在越来越明显,冷战期间和殖民后时期捐助国带有私利的政策已产生使许多国家,甚至整个地区的发展前景被扭曲的长期影响。

但是必须承认,官方发展援助的减少不仅仅是一个承认过去的错误或捐助者疲惫的问题。在有些情况下,这是一个声援削弱和危险的孤立主义抬头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强烈反对这些倾向。国际声援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的根本性质、关系到大家所属的人类社会的问题。如果现在正在世界上发生的全球化进程要真正具有人性,就需要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社区,其中有一种对人人,特别是最弱者共同的责任感。

教廷希望,哥本哈根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进程和2000年审查会议筹备工作的主要结果之一是重申对发展援助的必要作用的国际共识。这当然是决定在哪里和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这种援助的问题。但这首先是一个承认对国际声援的投资--这肯定是对建设一个更公平和更稳定世界的贡献--的问题,是对大家都有益的事。

工作方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通知各成员对文件A/INF/52/3所载的大会工作方案的一些更改和补充。

在10月22日星期三上午,大会的第一个项目将是听取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讲话。作为第二个项目,大会将审议题为“秘书长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十二条第二项提出的通知”的议程项目7。第三个要审议的项目是关于“选举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七个成员”的议程项目16分项目(b)。然后,大会将继续审议工作方案中所列的星期三上午的项目,但题为“联合国同经济合作组织的合作”的议程项目34和题为“联合国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合作”的议程项目40除外。现在这两个项目将分别改在11月20日星期四上午和11月25日星期二上午审议。

下午1时15分散会。